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

环境圆桌对话

探索和实践

王华 著

非外借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 第1000号 中国环境出版社

环境圆桌对话：探索和实践

王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圆桌对话: 探索和实践 / 王华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164-0

I. ①环… II. ①王… III. ①生态环境—研究—中国
IV. ①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1915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

环境圆桌对话: 探索和实践

王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164-0



2018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 3/4

定价: 45.00 元

CIDEG 研究论丛编委会

主编 薛 澜

编委 (按拼音顺序)

巴瑞·诺顿	白重恩	陈清泰	高世楫	胡鞍钢	黄佩华
季卫东	江小涓	金本良嗣	李 强	刘遵义	卢 迈
钱 易	钱颖一	秦 晓	青木昌彦	仇保兴	藤本隆宏
王晨光	王 名	吴敬琏	肖 梦	谢德华	谢维和
薛 澜	查道炯	周大地			

总 序

作为“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撰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IDEG）的标志性出版物。这个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9 月，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健康等，不光局限在相应的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机构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平台。而 CIDEG 正好可以发挥这种平台作用。CIDEG 的目标是致力于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以“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开展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与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改革滞后的金融服务体系；自主创新能力与科技全球化的矛盾，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 CIDEG 开展的重点研究方向。

为此，CIDEG 专门设立了重大研究项目，邀请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并提供相对充裕的资金和条件，鼓励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独立客观的原创性研究。CIDEG 期望这些研究是本着自由和严

谨的学术精神，对当前重大的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给出有价值 and 独特视角的回答。

CIDEG 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设立联席会议，对重大研究项目的选题和立项进行严格筛选，并认真评议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丛书编委会亦由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组成。我们会陆续选择适当的重大项目成果编入论丛。为此，我们感谢提供选题的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评委和编辑们。

目前，“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已经出版的专著包括《中国车用能源战略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实践：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中国县级财政研究：1994—2006》、《寻租与中国产业发展》、《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全面健康社会》等。这些专著国际化的视野、独特的视角、深入扎实的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规范的实证分析等，得到了广大专业读者的好评，对传播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论丛”中更多著作的出版，CIDEG 能够为广大专业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启发，也能够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2014 年 5 月

前言*

自 2000 年起,作者相继在中国的若干个省、市、自治区探索建立和应用利益相关者环境圆桌对话制度,以推动政府和企业改进它们的环境表现,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第一阶段的探索始于 2000 年止于 2005 年,以乡镇企业污染控制报告会的形式建立和实施。报告会由市、县环保局牵头组织,乡镇领导、辖区内主要污染企业、居民和社会代表参加,让企业和居民面对面,了解企业的污染控制状况和老百姓的需求,讨论污染控制改善措施,由企业和政府给出承诺,从而改进环境表现。这一阶段的探索在 2000 年从江苏的丹阳、天津开发区、贵州六盘水的九个乡镇开始,继而在江苏的丹阳和阜宁尝试常规化,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在江苏全省倡导推广。第二阶段的探索始于 2005 年止于 2011 年,形式由乡镇企业污染控制报告会改进为以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形式建立和实施。圆桌对话由居委会或环保社会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由对话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居民、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媒体等机构和人员的代表参加,就对话议题进行信息交流、对话协商、形成决议。这一阶段的探索在江苏省环境保护厅、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的推动下,在江苏、重庆、浙江、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三十多个城市的社区中组织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并形成了几种可行、有效、可推广的操作模式。目前,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正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的环境矛盾及其他社区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之中。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环境圆桌对话在我国的探索实践和研究情况,介绍了

* 本书调查、研究、撰写前后历时多年,选取的材料也跨多个时间段,其间,行政区划、机构单位名称多有所调整,这里为保证当时调查研究的真实性与材料的客观性,在最终出版时一仍其旧,望读者识之。

我国开展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的背景、组织及操作模式设计、地方应用状况及案例，介绍了就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开展的社会调查结果，并讨论了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在我国社会治理，特别是在环境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对我国环境、社会、政治、法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上述探索工作是作者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进行的，得到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基金和信用基金的支持，并得到世界银行同事 David Wheeler、Susmita Dasgupta 以及王佩坤等人的帮助。上述有关环境圆桌对话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作者主持的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项目在中国开展的，项目在国内的承担和合作单位包括：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丹阳市、阜宁县、姜堰市环保局，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重庆市社会科学院，万盛区政府，万盛区东林街道；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等政府部门和机构。做过重要贡献的个人包括（排名不分先后）：秦亚东、许纲熙、蒋巍、陆根法、毕军、王远、何书金、王良富、许学成、赵子宏、薛勇、申亚桥；沐华平、蒋建国、申大华、许玉明、丁新正；杨朝飞、别涛、张庆丰、王新、肖学智；曹风中、周国梅、国冬梅、周军、郭红燕；吴昌华；杨志峰、徐琳瑜；贾峰、曾红鹰、焦志强、陈瑶、崔丹丹等。作者衷心感谢上述所有项目参与者的贡献，并特别感谢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的贾峰主任，是他的领导、参与和推动使得社区环境圆桌对话能够在几十个城市的绿色社区建设中展开试点和应用，感谢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郭红燕博士，她帮助编写了本书若干重要案例。本书部分内容来自作者主持的世界银行项目报告；在本书完成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项目经费支持，郭红燕、李晓、黄德生等人帮助整理了部分背景材料，并对最终稿进行了编辑，作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作者对本书中所有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

王华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 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1
(二) 我国环境治理体制急需系统性变革	4
(三) 圆桌对话在工商企业界有广泛应用	6
(四) 圆桌对话是对当前公共管理方式的补充和完善	8
(五) 圆桌对话在国际公共管理领域已有实践	9
第二章 圆桌对话机制的设计	12
(一) 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的背景	12
(二) 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组织形式	13
(三) 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目的和原则	14
(四) 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主体	15
(五) 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组织程序	16
第三章 圆桌对话实践	22
(一) 第一阶段: 污染控制报告会	22
(二) 第二阶段: 社区层面的环境圆桌对话	23
(三) 最新进展	26
(四) 两种地方特色圆桌对话组织操作模式	28

第四章 圆桌对话典型案例分析.....	36
(一) 工业污染领域环境圆桌对话案例.....	36
(二) 噪声污染领域圆桌对话案例.....	49
(三) 农村污染领域圆桌对话案例.....	53
(四) 社区治理圆桌对话案例.....	55
第五章 效果评估问卷调查.....	76
(一) 概况.....	76
(二) 问卷调查设计和操作.....	76
(三)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77
第六章 讨论和总结.....	85
(一) 重要性.....	85
(二) 可行性.....	86
(三) 影响.....	87
(四) 挑战.....	89
(五) 总结.....	89
附录1：圆桌对话案例库.....	91
附录2：部分文件、会场照片和媒体报道.....	187
附录3：社区对话调查数据统计.....	204

第一章

引言

近年来,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单一的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体制需要系统性变革,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应该能够帮助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些问题。圆桌对话已经在国内外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在我国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具有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背景。

(一) 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随着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另外,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复杂,环境突发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社会安定和发展。

近几年,我国环境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至2011年间,我国突发性环境事件568起^①,而仅2012年一年的环境突发事件数量就达到了542起^②,2013年更增至712起^③,2014年降至471起^④,但仍保持平均每天1.3起的高发频率。环境突发事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事发区域的环境质量造成冲击性破坏,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极易对公众的生命、健康及财产产生危

① 环境突发事件平均2.6天1起 过半涉及危险化学品。<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3-02-22/140326330765.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2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4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害，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例如，2014年1月广东省茂名市公馆镇一汽车维修厂违规向河道排污，造成河道附近学校97名师生因吸入刺激性不明气体集体不适被送往医院，事后调查发现排污口处石油类污染物浓度超标3900倍，挥发酚超标15000倍^①，高浓度的污染物对受害师生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再例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造成大量有毒化学品燃烧泄漏，周边地区乃至北京民众都对事故造成的大气、水体污染表示强烈的担忧，监测结果也表明爆炸确实使得事发地一定范围内大气中甲苯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超标，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此次事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民众对危险化学品存储地选址环评、安评和监管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质疑并表达了忧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环境突发事件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引起伤亡的事件屡有报道，事件发生后，舆论尤其是谣言的传播极易引起群众的恐慌以及对政府应急处理的不理解、不满意、不信任，导致社会的不安定。

同时，我国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多，且危害性极大。据统计，当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由四类事件引起：一是大中城市铁路、公路、电力、垃圾焚烧厂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农村和中小城镇违法排污，包括暗管排污、私倒垃圾与危险废物；三是大型企业由于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流域性、区域性的污染事件；四是现代化工业项目建设^②。自2007年以来，厦门、大连、宁波等地陆续发生了抗议PX（对二甲苯）项目的环境群体性事件。2007年6月，数千名激愤的厦门市民以“散步”名义上街游行；2011年大连PX项目在建防潮堤坝受热带风暴影响发生溃坝，经抢险没有造成泄漏，上万名大连市民因此集会游行抗议，要求PX项目“滚出大连”，导致大连PX项目停产；2014年广东茂名市民上街反对PX项目并发生了打砸事件^③。诸如此类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是一种暴力边缘的诉求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包括上街堵路、静坐示威，甚至打砸党政领导机关、公共设施，与司法机关发生冲突，严

① 2014年中国突发环境事件471起 偷排偷放不容忽视。<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23/6999645.shtml>.

② 杨朝飞：《创新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思维 推动环保战略转型》，《全球化》2014年第6期。

③ 杨朝飞：《创新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思维 推动环保战略转型》，《全球化》2014年第6期。

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除此以外,如PX项目、核燃料、垃圾焚烧厂等大型项目的负面影响被舆论夸大,群众跟风相信并盲目抵制,导致项目无法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和中小城镇,乡镇企业违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而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2009年8月,陕西宝鸡市凤翔县长青镇发生了一起因血铅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逾600名儿童血铅超标,村民要求当地政府彻查14岁以上者及成人血铅情况并关闭工厂,但诉求无人回应,矛盾激化导致污染企业附近数百名村民强行冲进厂区进行打砸^①。在凤翔血铅事件发生仅仅几天之后,湖南武冈市文坪镇再曝血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组织检测的1958名儿童中1354名疑血铅超标^②,8月8日晚约千名横江村村民与约200名政府官员、警察发生对峙,警车被掀翻^③。环境群体性事件引起民众与政府、企业的纠纷甚至冲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国的环境问题还引发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的不公平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④。首先,城乡之间不公平。我国在城乡污染防治上的投资差距之大,使得中国农村水污染、耕地污染、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等问题无从解决,农村的环保设施少之又少。同时,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使得农村的环境问题加剧,城市环境的改善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其次,区域不公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源源不断输送给发达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最后,社会阶层不公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裕人群人均资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多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而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且无力应对因此带来的健康损

① 凤翔血铅事件。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XM2qCZLE-JryTx9d0QMn_B0xi48dhUJBP2JRS MkEDvTQU6KF89tW07V6AvcYvM8d6WyWSRaOSx1ncPeLeDEzK。

② 透视武冈血铅超标事件。http://www.xj.xinhuanet.com/2009-08/25/content_17503778.htm。

③ 湖南武冈血铅事件:千人与警察对峙 警车被掀翻。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8/20/content_18369685.htm。

④ 潘岳:《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环境教育》2005年第1期。

害。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公平丧失是威胁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依靠完善的行政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开发像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这样的社会机制。

（二）我国环境治理体制急需系统性变革

目前我国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法律、市场和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法律手段主要通过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对环境活动进行强制性约束，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市场和经济的手段则主要根据价值规律，利用排污收费、征收环境税、财政投资、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当事人产生和消除污染行为，可以促进经济主体改变自身行为决策，管理灵活且效率较高。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纠正环境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是必不可少的，对环境活动的最终效果明确，可操作性强。但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存在效率低、成本高、决策错误和环境不作为等问题。我国目前将经济业绩视为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忽略环境承受能力或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要求，很可能导致政府环境职能的失灵，这意味着政府行为的局限性，地方政府、部门在不受监督和缺乏竞争性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是政府失灵的一个症结^①。

在环境法治方面，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和规范性使得环境治理更有力、有效，具有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是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依据。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立法相对较晚，目前环保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法律制定粗线条，实用性和操作性不强，责任不明确，行政处罚力度过小导致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环保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环保执法的要求，执法

① 肖巍、钱箭星：《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

不严现象普遍。

环境经济手段在我国的应用已取得一定成绩,市场调节作用灵活性高、响应快、效率高,使得经济手段在环境治理中的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仍存在较多问题。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外部性,由此产生环境资源的无效配置,出现“市场失灵”。在各种环境经济手段中,我国的排污收费收税制度实行较早,但现在我国收费标准整体偏低,且不能包含全部的环境污染行为。在排污权交易上则存在缺乏法律保障,缺乏成熟的市场机制、监管机制,存在排污企业和环保监管部门间的寻租行为等问题^①。

上述“自上而下”的手段在我国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仍存在很多不足。政府和市场机制都存在“失灵”的固有缺陷,不能够解决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因此需要寻求社会“自下而上”的体制进行补充和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环境保护领域,就是要开展环境社会治理,即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推动环境治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搞好环境保护,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

目前我国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环境信息公开和服务、环境宣传教育、环境社会调查、环境社会监督、环境社会服务、公众参与政府行动、环境公益诉讼、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环境社会补偿机制和环境社会风险评估、预警和化解机制等方面,通过这些方式方法能够使得公众积极参与和推动环境治理工作,提高治理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取得更好的环境治理绩效。其中,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更强调社会自发解决矛盾纠纷,多个利益相关者针对某一环境问题共同交流讨论,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在30多个城市试验了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机制^②。实践表明,环境圆桌对话机制能够增进政府、企业和民众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有效化解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进一步推动环境政策法规的落实。

① 刘颖宇:《我国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的应用绩效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王华、郭红燕:《环境社会治理:从理念到实践》,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

（三）圆桌对话在工商企业界有广泛应用

圆桌对话，作为一个解决多方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方法，最早应用于工商界。1984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之后对于企业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和探讨逐渐开始发展起来^①。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和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②。后来由这一理论衍生出了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的形式。

国际上，工商界用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自1999年5月起，美国塔夫茨大学高等理工学院在两年时间内针对二手电子设备中热塑性工程塑料（主要针对电子设备中的塑料树脂）的回收发起了六次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③。塑性工程塑料综合了大部分塑料的优越性能，如耐热性、耐寒性、尺寸稳定性、绝缘性等，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等领域，随着工程热塑性塑料消费量的增加，其废弃物也在增加，因此它的回收再利用问题引起了重视。

① Bradley R. Agle, Thomas Donaldson, R. Edward Freeman, et al., Dialogue: Toward Superior Stakeholder Theory,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8, 18(2): 153-190.

② 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三则案例的启示》，《经济管理》2005年第23期。

③ Patricia S. Dillon, *Stakeholder Dialogues on Recycling Engineering Thermoplastic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to Build a Recycling Infrastructure for Plastics from Electronics*,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pp. 70-75.

这六次圆桌对话由美国环保局固废中心、西弗吉尼亚州聚合物联盟、切尔西回收与经济发展中心提供经济支持，聚集了塑料供应链（图1）上60多个代表机构，包括树脂供应商、铸模者、电子设备制造商，以及塑料回收商、电子设备回收商、终端消费市场代表，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工业专家等，并成立了三个任务小组来开发相关对策。每次对话由一系列分会或各小组会议组成，各方参与者讨论了塑料的回收再利用现状，发现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及机遇，围绕着供应链工艺、经济与市场开发等关键点最终形成了合作性的产业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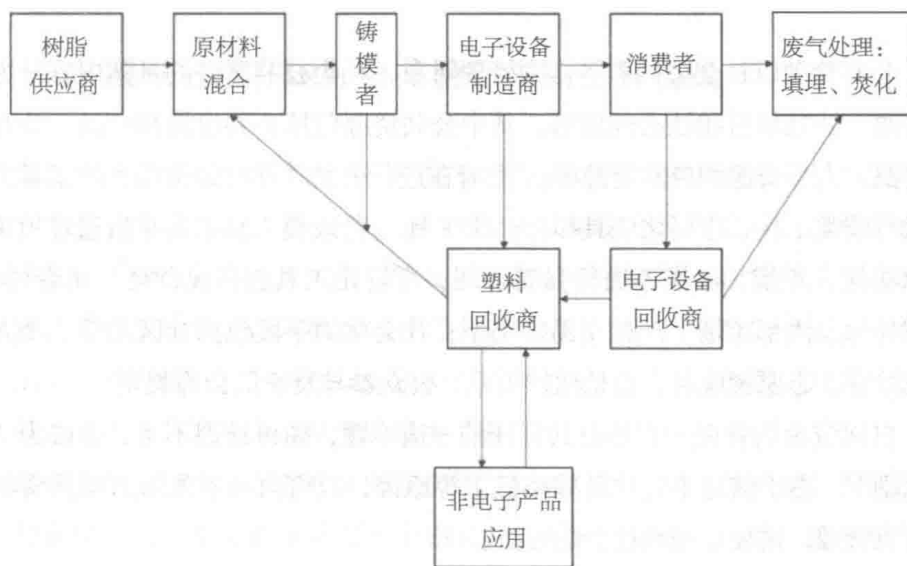


图1 塑料供应链

前两次圆桌对话探讨了塑料回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收集—处理过程成本较高、缺乏足够的回收市场（回收商的缺乏，消费者、使用者的主动回收意识较弱等）、电子制造商拒绝使用回收后的树脂材料（因为供给不能保证持续性、回收材料质量的不稳定，以及缺乏针对回收材料的使用说明）、树脂供应商拒绝供应再生性材料（担心销售情况）等。此后，圆桌会议从一般性讨论转变为对战略行动计划的讨论，探讨如何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建立一套完善的回收设施和市场。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途径，比如发展经济数据分